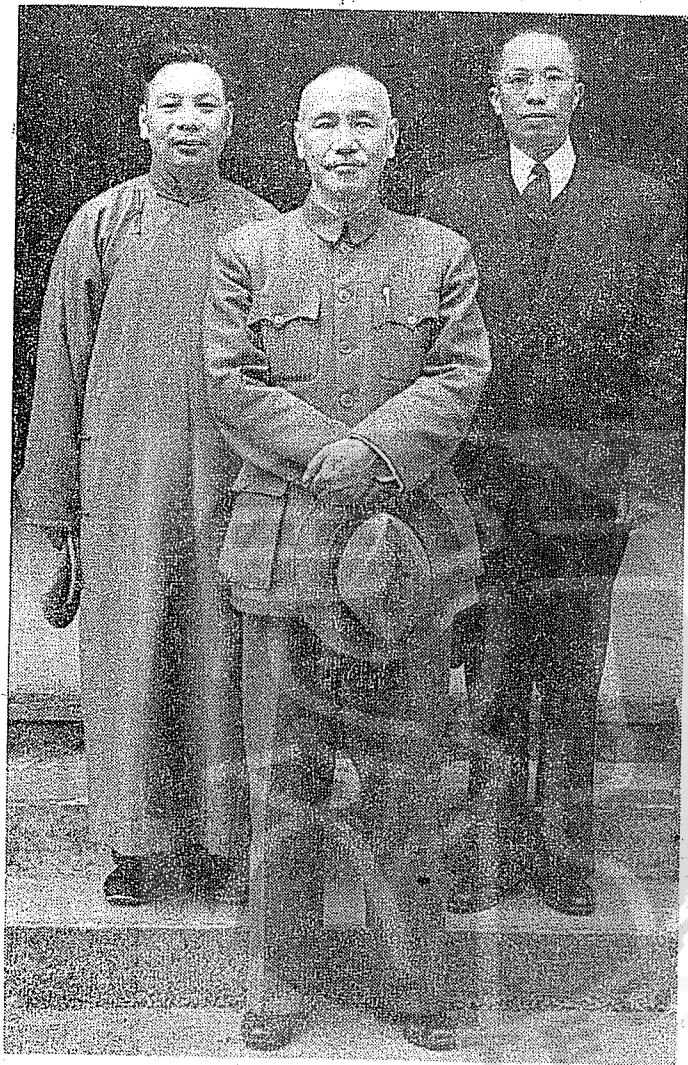


追憶俞鴻鈞先生

王紹齋



總統 蔣公與俞鴻鈞先生（右）蔣經國先生（左）合影。

芍藥花開出舊闌，青衫掩淚再來看，
主人不在花尚在，更勝青松守歲寒。

（唐：錢起詩）

俞鴻鈞先生歿于民國四十九年六月一日，享年六十四歲，他逝世已逾十六年了。今年一月卅日（農曆十二月十二日）是他八十歲冥誕。筆者在過去十六年中，每逢農曆十二月十二日暨國曆六月一日均必先赴陽明山俞先生的墓園致敬，然後再到中山北路他的故居憑弔一番，惟一入大門，庭園景物依舊，而人事已非，不免感慨系之，坐在他客廳中回想過去的「一切」猶一幕一幕的出現在我腦海中。

上海市府秘書科長

我得識俞先生係在民國十六年多，張定璠先生初接任上海市長之後，當時周雍能先生任秘書長，俞先生係周秘書長舊友，被邀担任英文秘書，並兼宣傳科長，我原在周雍能先生任安徽財政廳長時在財廳任職，旋因唐生智反叛中央，出兵



。影留者記外中待招（者圖地指鞭教持手）生先鈞鴻俞，發爆爭戰日中三一八

安徽佔領了安慶，我由安慶逃往漢口轉回到江西南昌，聽到老長官周先生在上海市府任職，即約同周先生舊部數人投奔上海，惟當時江西在共匪騷亂中，南潯鐵路被共匪控制，郭沫若坐守九江，檢查甚嚴，不易通行，只得由鄱陽轉德安步行至玉山

施高塔路一幢小洋房內，記得他首次帶我到他家晚餐，介紹他的夫人和三位女公子和我認識，他的長女公子僅九歲，次女公子六歲，最小女公子三歲，並且令最幼女公子表演彈鋼琴。如今她們都已子女成行，且多已婚配生孫，這證明我是應該老了，毋怪住在我樓上的小太保因我叫他不要在上面淋水，他要罵我「老不死」呀！一笑！

尊翁軼事別有卓見

入浙江開化，再乘小船到杭州，旅行月餘始抵滬，到滬後被派在市府第一科任監印職務，我係單身，住在楓林橋市府樓上後面一間小屋中，樓下即係宣傳科辦公室，我經常去該科找一班年青同事坐談，是時俞先生亦不過三十零歲，喜與青年同事接近，當時我對他的印象是一位翩翩公子，鼻架金邊眼鏡，西裝畢挺，有時着長袍，和藹可親，說上海話和國語都帶些廣東音調，他上下班自己駕駛他私人棚式小汽車，生活似頗舒適。有時他會用他的小棚車載我們去兜風，而且請客吃廣東小館，談談上海掌故等，因此我們彼此有了相當認識，他那時住在

俞先生家道小康，他的尊翁庭柱先生在上海經營豬鬃廠，係專門出口銷外國的，他老先生在上海商界廣幫中亦屬知名人物，他逝世以後，並沒有遺留下大宗財物，却有兩件事我聽了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是他曾娶有兩位侍妾，他在未死之前，已為兩位侍妾在蘇州及杭州兩地分購寺院一座，他逝世後，兩位侍妾分赴蘇、杭出家修道，不留絲毫遺產于子孫，此種作風，堪稱一絕。

談到過去粵商在滬娶侍妾事，當時在上海極為普遍，如俞先生的父執、粵籍富商陳炳謙先生，是上海祥茂洋行的買辦，他娶有十位侍妾，都住在海格路澄廬別墅內，記得某次宴會中，杜月笙曾親口笑問陳先生道：「你娶了十位太太，而且能住在一起，真是了不起，請教有何祕訣？」陳先生答說：「很簡單，我尊重太太太為至上，由她將這班侍妾如同管教女兒一樣管教，一切事都容易解決了。」可見此老頗有辦法。惟時代進步，我想此老如在今日亦無法享此豔福了。其次俞老先生還有一句遺言留給俞先生：「外行生意

施高塔路一幢小洋房內，記得他首次帶我到他家晚餐，介紹他的夫人和三位女公子和我認識，他的長女公子僅九歲，次女公子六歲，最小女公子三歲，並且令最幼女公子表演彈鋼琴。如今她們都已子女成行，且多已婚配生孫，這證明我是應該老了，毋怪住在我樓上的小太保因我叫他不要在上面淋水，他要罵我「老不死」呀！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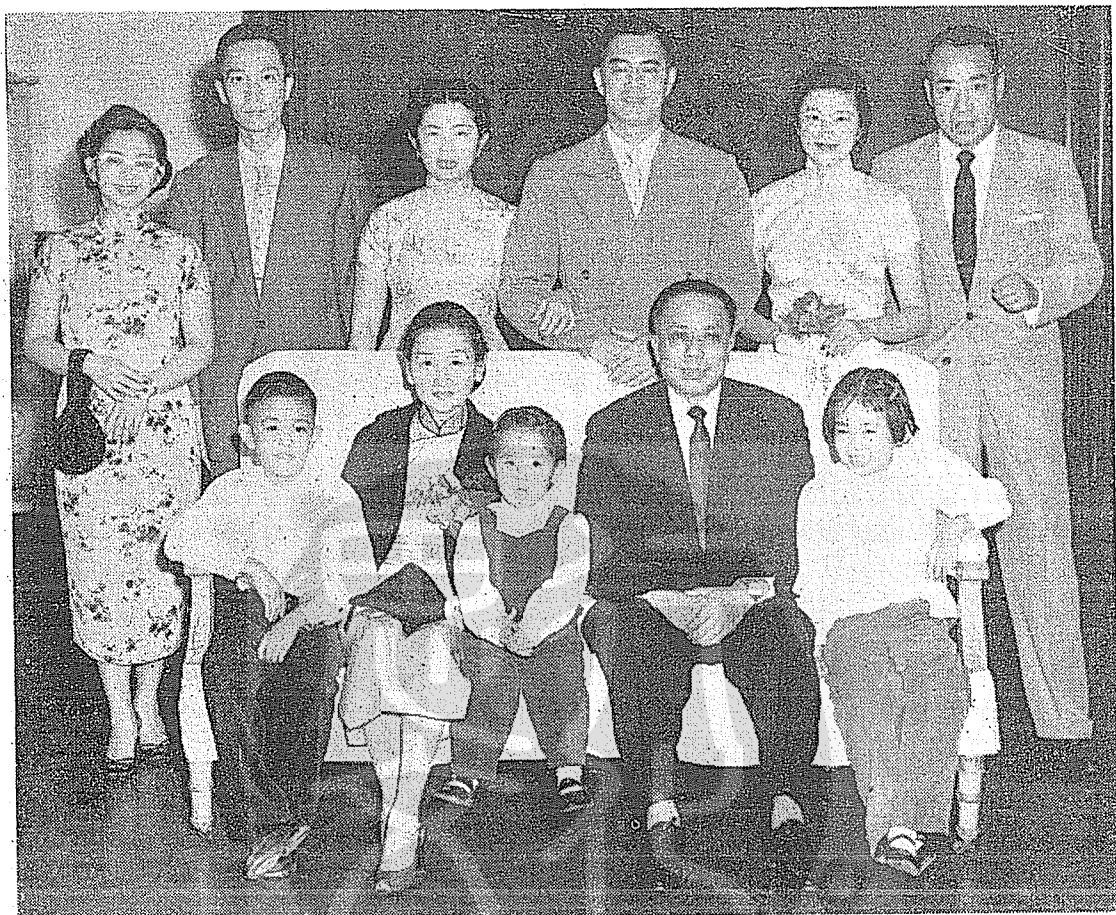
影留賓外待招公蔣 統總侍陪長院鈞鴻俞

絕不可做，內行生意如無權不可參與。「俞鴻鈞先生將此言終身奉為圭臬，俞先生一生雖未經商，但他常將俞老先生的話規勸親友。俞老先生雖屬商人，而他的真知卓見却令人佩服，決非等閑人物。

審核賽馬支出往事

我在上海市府監印不久，周雍能祕書長鑑於所屬各局每月送到支出計算書據堆積如山，無人過問，特調派我和第二科科員竇孟幹、劉振華三人組織審計小組，擔任審閱工作。當我開始審核財政局所送賽馬支出計算當時，發現一月舉行數次賽馬，財政局只派二、三人前往收稅，而每次該局竟報銷數千元，審核其所送單據內容：大都是購中西筆墨紙張十數打，茶葉數十斤，毛巾數十打等，使我們大為驚奇！竇、劉兩位同事年事稍長，世故較深，認為不如馬虎了事，我當時少年氣盛，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力主予以揭發，否則有虧職守。當時財政局長為王和先生，他是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白總司令崇禧麾下的要員，主辦科長曾某又是王局長的親信，竇、劉兩君均不欲開罪於他們，於是推我主簽，我以稍帶諷刺滑稽口吻簽註：「查核財局每次賽馬只派二、三人去收稅，如果手足並用，亦不需許多筆墨紙張，譬如許茶水毛巾，如果要招待觀客又嫌太少，同人百思不解，函請轉飭財局答復。」劉君不但不肯蓋章，且回到二科去簽辭兼職，竇君則勉強蓋了章，我却不顧一切立即送呈周祕書長核閱，周祕書長看到後大為震怒，認為應予整飭。旋經提出市政會議，王局長亦遭到各局長的責難，最後補救辦法：是既往不咎，立即在市府設立第四科，主辦審計事項，派費紹宏先生為第四科長，調派我在第四科任審計股長，俞鴻鈞先生的宣傳科改稱第五科，俞先生於審核賽馬支出一案，對我極為贊許，認為我辦事認真，而且有革命的勇氣。

我在第四科任職時，曾協助費科長撰擬會計規程，建立會計制度，並將各局處舊式賬簿改為新式賬冊，以便審核而杜絕浪費。旋因桂系反叛中央，張定璠市長因病辭職，財政局王局長亦辭



俞 鴻 鈞 先 生 與 家 人 合 影

，由周雍能祕書長代理市長，派俞先生代理財政局長。張定璠市長辭職獲准，中央派張羣先生繼任市長後，俞鴻鈞先生奉調回市府任參事兼預算委員會主任委員。我當時是編審預算的主辦人，於是我與俞先生接觸的時間更多了，他所需的一切資料報告均係我代他準備，因此他對我更有深一層的認識。

從代祕書長到市長

民國十九年馮、閻聯合汪精衛在北平與中央對抗，上海市政府兼祕書長潘公展遠走日本，遲遲不歸，張羣市長改派俞鴻鈞先生代理祕書長，我奉派在祕書長室代他核閱文稿，但仍兼第四科職務，直到張羣市長辭職，中央派吳鐵城先生繼任上海市長，俞先生真除祕書長，我亦被升調為祕書離開第四科辦公室，專在祕書長室辦公，旋吳鐵城先生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俞鴻鈞先生奉命代理市長，我又兼任第一科科長，八一三中日戰爭發生後，上海淪陷，俞先生赴港，仍留我駐在上海，因戰爭結束時由南市撤退入法租界的保安團隊等官兵數萬人，留在法租界集中營，他們所有給養，都由我向中央政府領取轉發，故法租界當局對我保護周密，二年後汪精衛的奸黨到達上海，黨部大部份人員被其吸收，我在上海已無法藏身，當時集中營官兵已經法租界當局陸續釋放，所餘無幾，我乃奉准離滬赴港。綜計我與俞先生在上海共同工作足足有十年之久。

上海淪陷後，俞先生在香港與我通訊，係化名「李聰」，據他告訴我：「他母親姓李」，所以用李聰之名，意在紀念母親。我則用筆名「王魯」，這是我早年投稿的化名，我離滬以後，留在上海的同事與我通訊，仍用此名，不料早引起了日方的注意，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進佔法租界，即以「王魯間諜案」將留駐上海同事周松鶴、周國屏兩君捉拿去審問，並查封他們的家財，查封我和他們在上海淪陷後合資所創辦的「強華針織廠」；最後兩位周君幸經當時投偽的同事保釋，而強華廠則被迫封閉拍賣，個人損失不貲。

（下期續完）